

# 组织民族联合阵线：《生活星期刊》的《信箱》栏目研究

陈长松 李雨蔓

[摘要]《生活星期刊》是邹韬奋所办“六刊一报”中“六刊”之一，始于1936年6月7日，终于当年12月13日，历经两次更名，共发行28号。刊物尤为重视《信箱》栏目，共计发表52封来信，其中33封附有编辑回信。来信聚焦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核心议题，彰显了读者大众对民族、社会及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回信则致力于增强社会各界对抗救事业的共识与行动力，表现出救亡启蒙与政治动员的双重特征，不仅坚守了邹韬奋“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办刊理念，还有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全面抗战准备了“新青年”，完成了刘少奇在创刊之初所提出的刊物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人民阵线”“应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的嘱托。

[关键词]《生活星期刊》 信箱 邹韬奋 民族联合阵线

韬奋精神  
研究

## 一、引言

《生活星期刊》初名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周日副刊即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由于多种原因，《生活日报》发行至第55号后“停刊”，而周日副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于8月2日更名为《生活日报周刊》（第9号）继续出版，又出2号后，再于8月23日更名为《生活星期刊》（以下简称《星期刊》）迁往上海发行。《星期刊》发行完第25号后，邹韬奋因“七君子事件”被捕入狱，改由金仲华代理编务，又发行3号，至第28号（12月13日）停刊。可以说，《星期刊》历经曲折，不仅先后两次更名，发行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半年。然而，在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历经曲折反映的恰是邹韬奋对抗战御敌、民族解放的矢志追求和不懈努力，《星期刊》及其《信箱》栏目正是邹韬奋上述爱国心态与救亡实践的真实写照。

28号《星期刊》中有25号设有《信箱》栏目，共刊登52封来信，其中33封附有编辑

回信。表面来看，来信与回信数量不多，刊物存续时间也只有半年，然而《星期刊》的《信箱》栏目重在“讨论重要问题”。《生活日报》虽也设有《读者信箱》栏目，但两者名称与定位都不同，《生活日报》的《读者信箱》主要以“报告事实或发表关于某些时事的简明意见”为主，《星期刊》的《信箱》主要用于“讨论重要问题”<sup>[1]</sup>。尽管《生活日报》停刊后，《星期刊》的《信箱》栏目开始“兼顾”日报原有的《读者信箱》来信，但是邹韬奋很快便决定在《信箱》之外另加《短筒》一栏。《短筒》用于“简略答复某些来信”，《信箱》刊登“较长的报告和讨论重要问题的来信”<sup>[2]</sup>。“讨论重要问题”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读者来信都能在《信箱》刊登，只有讨论重要问题的报告与来信方能在本栏刊登。这与邹韬奋此前《生活》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的《读者信箱》多有不同，也与《星期刊》的《短筒》不同，而学界对《读者信箱》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生活》周刊时期的《读者信箱》<sup>[3]</sup>。鉴于此，讨论《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补充、丰富邹韬奋的办刊实践与办刊思想。

## 二、来信与回信概览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共刊登 52 封读者来信与 33 封编者回信，具体情况见表 1 所列。

由表 1 可见，来信 52 封，回信 33 篇，回

信率约为 60%，除第 7 号、第 13 号及第 28 号只有来信，没有回信外，其余 22 号均有编辑回信，此种情状反映出编者对此栏目的重视。尽管并非所有来信人都标明具体身份，但根据来信内容可以判断，50 位来信人中，青年约有 20 位，而青年学生有 12 位，其中前 11 号（香

表 1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信与回信情况

期号	发行时间	信件名称	来信人	地址	身份	编者回复
第一卷 第一号	1936.6.7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	莫文华	天津		有
		理论与实践	丽生	清华		有
第一卷 第二号	1936.6.14	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先决条件	彬生	广州	中学教员	有
		人民阵线的危机	王保新	汕头		有
		谈生活日报	季成章	广州		有
第一卷 第四号	1936.6.28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季峰	广州		有
		关于救国会议	吴哲夫	福州		无
第一卷 第五号	1936.7.5	关门主义与学生救国运动	张作荫	广州	青年学生	无
		推广大众文化的根本问题	镕炉	广州		有
第一卷 第六号	1936.7.12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莫文华	天津		有
		关于救国联合战线的几个疑问	林中	上海		有
第一卷 第七号	1936.7.19	三个营垒	文明	北平		无
第一卷 第八号	1936.7.26	抗敌救亡与军阀末路	司徒彦文	中大	中大大学生	有
		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	刘文鹤	广州		无
第一卷 第十一号	1936.8.16	关于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	攻力			有
第一卷 第十二号	1936.8.23	几个疑问	萧始	无锡	青年	有
第一卷 第十三号	1936.8.30	苦斗	刘公人	天津	东北抗联战士	无
第一卷 第十四号	1936.9.6	爱人与祖国	唐人	新加坡	青年	有
第一卷 第十五号	1936.9.13	倾诉	王德谦	沧浪亭畔 (苏州)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十六号	1936.9.20	惨痛的经验	率真	新疆玉河	乡村工作者	有
		理智与情感	金草			有
第一卷 第十七号	1936.9.27	嫖赌的价值	运春		机关职员	有
第一卷 第十八号	1936.10.4	在天津的一个夜里	黄铃	天津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十九号	1936.10.11	枪口余生	云桥		韬奋友人	有
第一卷 第二十号	1936.10.18	中国人的生命 梦	张凭 书平		小学教员	无 有



续表

期号	发行时间	信件名称	来信人	地址	身份	编者回复
第一卷 第二十一号	1936.10.25	平津学生的新动向	袁启新	天津	青年学生	无
		谋生与屈辱	王卓夫	南京、镇江	青年职员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二号	1936.11.1	惨死	小婴	通州	青年	有
		不敬	读者十二人			有
		追逐异性	王镛	华大 (武汉)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三号	1936.11.8	我的外交	茗柯		政府职员	有
		挨了耳光空洒泪	石田	上海		无
第一卷 第二十四号	1936.11.15	纱厂工友们的呼声	沪东杨树浦 日商纱厂全 体工人	沪东 (上海)	工人	有
		民众广大的力量	李朴生	新加坡	政府职员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五号	1936.11.22	救国组织和时事研究	王义	菲律宾	青年学生	有
		伟大战士的损失	杨家蕴	西京 (西安)		无
		法律和眼泪	一个华北的 学生	天津	青年学生	无
		阿静	朱光	沪西 (上海)		有
		怎么回事?	汪盈	镇江	青年学生	有
		一件严重的事实	袁启新	天津		无
第一卷 第二十六号	1936.11.29	求生的斗争	一个工友	上海	青年工人	无
		血泪的私蓄贡献国家	宗棠			有
		热血沸腾的时候	张海萍	上海	青年女士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七号	1936.12.6	不算人	赵公望	上海		无
		不能再沉寂了	顽痴		厦大学生	无
		两重悲哀	难隐		青年学生	无
第一卷 第二十八号	1936.12.13	僧伽怎样救国	佩洛	镇江	青年僧伽	有
		感动得流泪	炎中		厦大学生	无
		可耻的一幕	黄慎之			无
		和汉奸有什么分别	张世萍	芜湖	小学教员	无
		旧书店里特殊顾客	崇熙	北平		无

港时期)青年来信较少,后17号(上海时期)青年来信较多,这颇能表明对青年(学生)动员的成功;除青年学生外,来信人还有政府职员、工厂工人、店员、小学教员、韬奋友人等,身份的多样性也颇能说明《信箱》的广泛影响。从地域分布来看,注明地址的信件共有38封,约占70%,涉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9个国内省区,以及菲律宾和新加

坡两个海外地区,其中,前11号自广东的信件占比最大,共7封,约占同期来信总数的50%;后17号来自上海和江苏的信件最多,共11封,约占同期来信总数的30%;而北平、天津、南京、武汉、西安等“重要城市”,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等“边远地域”的来信也颇能反映《星期刊》的发行范围与《信箱》的深远影响。

### 三、栏目主题：促进民族解放运动

《星期刊》创办于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目的在于“努力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信箱》栏目也不例外。经梳理与归纳，本文将读者来信分为四类：讨论联合阵线、发起救国运动、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和文艺救亡。

#### （一）讨论联合阵线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5月31日，中共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邹韬奋成为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在此背景下，宣传、讨论联合阵线自然成为《星期刊》及其《信箱》栏目的一项重要工作。《信箱》刊登的首封来信即是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并先后发表一组信件深入“讨论”了联合阵线问题。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阐述了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的性质和任务，认为“救亡的人民阵线应该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级联盟，从最进步的阶级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sup>[4]</sup>。编辑在回信中表示认可，并补充强调“现在应该不论何党何派，要立刻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集中力量，抗日救亡”<sup>[5]</sup>。

王保新的《人民阵线的危机》则认为“救亡的人民阵线诚然应该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组织方面，仍须严格，至少要不许汉奸混入”<sup>[6]</sup>。编辑在回复中表示，王保新的来信提供了警示，但是强调不能因此放弃对促成人民阵线扩大化广泛化的努力，“凡是没有被证实已经甘心做汉奸的，都应鼓励加入，但是那些已甘心做汉奸的人，必须作无情的制裁”<sup>[7]</sup>。

刘少奇在《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复信中表示不赞同王保新的看法，认为这种“危机”

心理的叫出会吓退许多人参与人民阵线中来，强调“人民阵线是不能拒绝那些愿意抗敌的军官，官吏，资本家来加入的”<sup>[8]</sup>，有力批驳了关门主义的论调。编辑对此表示赞同，并主张以民族联合阵线来替换人民阵线这一名词，“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联合阵线；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sup>[9]</sup>。同号林中来信提出关于救国联合阵线的四个疑问，编辑也在回信中逐一解答。攻力在读完邹韬奋所写关于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的笔谈后，来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编辑结合邹韬奋的文章，耐心纠正了攻力的错误理解，表示“在阵线之下做理论斗争足以分散抗敌力量”是一种过虑，因为“正确的理论也是抗敌的一种主要力量”<sup>[10]</sup>。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法宝。香港时期《星期刊》的《信箱》通过多篇读者来信及编辑回复不仅营造出热烈的讨论氛围，还利用香港这一特殊环境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社会各界一致抗日的态度与主张，邹韬奋本人也提出用“民族联合阵线”代替“人民阵线”的建议，这些都为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二）发起救国运动

华北事变后，平津地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率先行动，先后发起“一二·九”“一二·一六”等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救亡热潮，上海反应尤为激烈。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而邹韬奋是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也是《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7.7.15）的联名起草人之一<sup>[11]</sup>。可以说，救国运动是邹韬奋此时办刊实践的首要关切，《信箱》通过来信对救国运动予以积极的报告和讨论。

就学生救国运动而言，季峰在《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来信中总结了半年来学生运动的六条缺点：“领袖人物的学识不够”“不了解联合阵线”“不应以明确的党派作为号召”“没有组织”“领袖人物胆力不够”以及“不应以反对会考为号召策略”<sup>[12]</sup>。编辑在回信中主要针对



“学生运动领袖人物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不能把领袖看得过于超过其领导的群众”，且“领袖的产生不是好像突然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艰苦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不能凭空希望领袖出现，而应该选出有能力和勇气的同学，使其在实践中进步<sup>[13]</sup>。此外，张作荫作为参加过救国运动的青年，在《关门主义与学生救国运动》中表示学生救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联合阵线的一部分，不能犯关门主义的错误。袁启新则在《平津学生的新动向》中报告了平津学生们目前正在着力克服关门主义、盲动等错误倾向，力图日后取得更大成效。上述来信不仅动态报告了学生运动，并与复信一起检讨了学生运动，这些均有助于推动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

1936年11月至12月，中国绥远地方当局与日本支持的蒙古分裂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局部战争，史称“绥远抗战”。为了支持绥远当局，上海35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简称“一日运动”）。《信箱》刊发了5封有关“一日运动”的来信。宗棠的《血泪的私蓄贡献国家》来信叙述了同事方君将辛勤积攒的本可用于医治病情、改善生活的十余元血汗钱无私捐赠的“壮举”。厦大学生顽痴的《不能再沉寂了》报告了厦大同学在市场开展募捐，市民纷纷慷慨解囊的“一日运动”，反映了民众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坚定支持。乡村工作者炎中的《感动得流泪》来信列举了“一日运动”中募捐工作者应注意的相关事项。当然，并非所有来信都洋溢着乐观与鼓舞。青年学生难隐写信抒发了“两重悲哀”：一是“对于绥远抗敌军的捐助没有办法”；二是眼看着日本飞机在天空中分发传单，心中苦闷<sup>[14]</sup>。张世萍在《和汉奸有什么分别》来信中讲述芜湖小学生们参与募捐，却被阔佬们雇佣的奴才辱骂殴打的惨痛情形。上述来信，编者只回复了宗棠来信，对方君、宗棠等人的捐赠行为表达了“最诚恳的民族敬礼”，“中国有这样的爱国国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sup>[15]</sup>。尽管如此，对各地募捐运动的报告，或鼓舞国民或警示民众，有力宣传并推动了“一日运动”。

上述来信或理性剖析救国运动的短板，以求改进；或如实反映各地救亡实况，直抒爱国

热忱。编辑回信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能够阐发独到的见解和思路，以此引导、推动救国运动。可以说，《信箱》已经成为读者与编辑讨论救国运动问题的“阵地”，也为日后更为广泛的抗战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揭露日本侵略暴行

在讨论联合阵线，发起救国运动的同时，《信箱》还刊登7篇读者来信，通过读者讲述自身或友人的屈辱经历，有力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各种野蛮无耻的侵略行径。

在《枪口余生》中，邹韬奋的好友云桥描绘了自己回国途中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无端被一位自称为日本宪兵司令的人拘留，命悬一线，几近枪决，幸得同行的欧美友人相助，方得幸免于难。经历此难后，云桥才“深切地了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sup>[16]</sup>。石田《挨了耳光空洒泪》记录了自己与一名日本人偶然发生碰撞，却遭受对方的一记耳光，原本想追上去讨回公道，但却被人劝住，“……您预备怎样办？单单打坏他们几个人，与整个侵略者并没有多大的损害……”，听完这些话后，“沸腾的血慢慢降到冰点”，并“陷入沉思迷惘的深渊里”<sup>[17]</sup>。袁启新的《一件严重的事实》通过讲述因参与救国运动而被捕的好友的狱中经历，指出天津警权已在日本管辖之下，“天津已经走上了全部殖民地化的道路”<sup>[18]</sup>。赵公望的《不算人》则讲述了在日读书的亲戚及其同学因阅读《星期刊》被日警发现，“即逮捕入局，加以毒打”，“两人皆分别逮解回国”的屈辱经历<sup>[19]</sup>。黄慎之的《可耻的一幕》描绘了穷苦百姓向日本人乞讨，日本人故意撒钱，百姓们“拼了命似的争着抢着地上的钱”，日本人则乘机拍照作乐的“一幕可耻的怪剧”<sup>[20]</sup>。

当然，编者也不失时机“回应”部分来信，在引导读者讲述个人经历的同时，鼓励读者要有信心，坚持行动。云桥的《枪口余生》是其给邹韬奋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短信”，邹韬奋收信后立即回信，在安慰好友的同时也“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云桥接信后又写了第二封“长信”（差不多一版篇幅）详细报告了枪口余生的屈辱经历。茗柯在《我的外交》叙述了因反对强制征订日本报纸而与日

韬奋精神  
研究



本人产生冲突的经历。编辑在回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文化侵略的险恶用心，“煽惑和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建议读者“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量”<sup>[21]</sup>。黄铃的《在天津的一个夜里》写于“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信中揭露侵略者的可憎面目——“在空中清晰的传来敌人庆祝胜利的枪声，响着帝国主义残忍的欢笑”，透露出一丝悲观无望的情绪<sup>[22]</sup>。编辑读完此信后虽不禁“流下泪来”，但仍鼓舞读者，“不必悲观，我们好好保住自己，留为他日民族战场上效力吧！这日子一定不久了”<sup>[23]</sup>。可以说，编者回信虽然不多，但恰到好处，直指要害的同时，又鼓舞读者组织起来，集体反抗。

《信箱》对日寇暴行的揭露主要以读者对自身屈辱经历自我呈现为主。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读者的这种自我屈辱的呈现不仅是对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还能激发其他读者的愤慨，让读者们清醒认识到国家危亡的惨状。编辑对此类来信回复虽少，但对问题的分析切中要害，让悲观的读者看到希望，让勇敢的读者组织起来，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读者的抗战启蒙，对青年做了有力的战前动员。

#### （四）文艺救亡

文艺承载着民族精神，在日寇紧逼、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文艺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肩负着文艺救亡的特殊使命。《星期刊》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除了组织笔谈讨论文艺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问题外，《信箱》也刊登了4篇与文艺救亡相关的来信，有力促进了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形成。

关于创作自由与联合阵线问题，刘文鹤在《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信中质疑了黎觉奔《创作自由论批判》（《生活星期刊》第7号）一文流露出的关门主义倾向，表示创作自由论才是“最适合现阶段文艺救亡运动的口号”，强调应该从联合阵线上去认识创作自由问题，倡导文艺界建立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文化繁荣，“目前有许多〔宗派对立〕观念很深的批评家，热衷于内战的作家

们，解放开来，不要去限制人家的创作，把最大限度的自由给予各种各色的作者，共同去争取民族的解放自由吧！”<sup>[24]</sup>此信深化了有关文艺创作自由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围绕推广大众文化问题，镛炉在《推广大众文化的根本问题》中指出推广大众文化的两大核心要义：一是“推广大众文化的刊物须非常的廉价”，二是“须在乡村多设代售前进刊物处”<sup>[25]</sup>。编辑对此表示赞同，但无奈指出目前还没有“大量的经济来贴本赠送”，只能在“推广销路方面着手”，至于在乡村设立代售处，也“只能等到经济力量办得到时酌办了”<sup>[26]</sup>。读者镛炉的建议虽受资金限制还无法实现，但这些探讨为后续的文化推广工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信箱》还刊登了两封报告鲁迅追悼会的来信。作为当时文艺救亡的代表人物，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离世，社会各界纷纷举办追悼会，不仅表达这位伟大救国斗士的哀思，还以此激发民众抗敌救国的热情。杨家蕴的《伟大战士的损失》再现西安鲁迅追悼会的情景，信中提及由主席宣读的祭文：“我们西京文化界一定本先生的遗志，学习先生的教训，向中华民族的敌人，被压迫民众的敌人，人类文化的敌人，作残酷的斗争，不达最后的胜利不止。”此外还报告了追悼会上提出“成立西京文化界协会”的决议，彰显了文化界团结一心、抗敌救国的决心<sup>[27]</sup>。同期，“一个华北的学生”的来信《法律和眼泪》首先报告了天津鲁迅追悼会的情形，写下“为了祭奠我们民族解放当中始终不屈的英勇的斗士”，“我们的热泪夺眶而出。法律是干涉不了人们的哭的”这样悲痛的文字；其次报告了追悼会的“后续事件”——因日本方面的授意，追悼会主席被拘留，开会所借用学校的校长被处分，区域警察被解雇，同学被逮捕等<sup>[28]</sup>。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凸显当局的软弱无能，更能激起读者的愤慨，自觉地加入抵抗队伍。

可以说，来信者积极探索大众文化推广之道，力促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建立。同时，这些来信也能够引发社会对文艺救亡事业的关注与思考，有助于提升文艺界乃至全民族抵御外敌

的凝聚力,《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成为当时社会大众探讨文艺救亡问题的重要平台。

#### 四、栏目特点:旗帜鲜明、情理交织与善于引导

《星期刊》创办于日寇紧逼、民族危亡的时代情境下,抗日救亡成为邹韬奋报刊实践的首要关切,因此相较于《生活》周刊时期,《星期刊》的《信箱》呈现新的特点:旗帜鲜明地宣传联合阵线;理性与感性交织并重的讨论方式;善于引导,凝聚救亡共识。

##### (一) 旗帜鲜明地宣传联合阵线

邹韬奋是在日寇紧逼、民族危亡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背景下创办《生活日报》的。邹韬奋此时已是救国会的领导,且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成为中共的同路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救亡统一阵线”的主张。尽管迫于形势才来到香港办报,但邹韬奋将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办报的根本目的,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联合阵线政策。

《信箱》栏首封来信即是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来信。刘少奇此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人,也是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邹韬奋参与并担任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上海成立的<sup>[29]</sup>。首封来信即刊登刘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并对信中表达的意见“深以为是”,足以显示邹韬奋对刘少奇来信及其提出的人民阵线政策的重视。刘少奇还在信中对《生活日报》的宗旨提出了“建议”,“我觉得贵刊应承担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贵刊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此。”他还对《生活日报》提出了期望,“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彩群的权威的刊物。”事实上,刘少奇的来信奠定了《生活日报》《星期刊》及《信箱》栏目的基调,而《信箱》成为邹韬奋宣传、组织联合阵线的一个阵地。

香港时期,《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信者多为对救国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

群体,因此这一时期《信箱》栏目选登的来信与编辑回复,主要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和性质问题,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思潮,为联合阵线的构建指明了方向。上海时期,《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信内容更加多样,展现出作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社会价值。尽管上海时期《信箱》来信没有直接就联合阵线问题展开讨论,但它们均服务于建立抗日民族联合阵线这一关键任务,相关来信报告了各地救国实践,来信者身份构成也更多元,不仅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及救国运动参与者的比例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如青年僧侣等特殊身份来信人。通过选取各地不同身份读者的来信,邹韬奋将《星期刊》《信箱》栏目打造为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的公共论坛,有助于社会各界团结一心,集中力量抗日救亡,从而为构筑最广泛的抗日民族联合阵线作出积极贡献。

##### (二) 理性与感性交织并重的讨论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进侵华进程。在此国家危难之际,邹韬奋带领着《星期刊》的《信箱》栏目,紧跟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构筑一个情理交融的公共对话空间。在《星期刊》的《信箱》中,编辑与读者既注重理性交流,也进行情感表达,这种理与情的融合交织的讨论方式,不仅丰富了栏目的思想内涵,也使其成为记录时代心声、展现民族精神的重要平台。

在理性探讨层面,《星期刊》的《信箱》栏目聚焦全民瞩目的核心救国议题。它不仅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更是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平等展示多元观点,以此构建理性共识。以对民族联合阵线问题的讨论为例,邹韬奋选取并刊登了莫文华(即刘少奇)与王保新等人的信件,来信者围绕联合阵线的构成问题各抒己见,从不同视角展开激烈讨论,编辑也在回复中表明态度和立场,最终在思想激荡中达成共识的凝聚。

在感性表达层面,栏目亦不乏真挚情感的抒发。邹韬奋设立的《信箱》,不仅成为各界探讨救国策略的平台,也开辟了一个让读者真诚吐露心声的空间。读者通过来信记录自己的亲眼所见、真实所感,表达了对日寇的愤恨、

韬奋精神  
研究



对同胞苦难的悲痛以及参与救国运动的热忱。例如，张海萍在信中提及丈夫为大众奋斗而牺牲，留下她与幼女相依为命，即便如此，她仍怀揣着为救国运动贡献力量的决心：“日前中华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救亡运动的责任在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时候，我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sup>[30]</sup>《星期刊》的《信箱》栏目通过刊登这些信件，激起广泛的情感共鸣，唤醒民众的救亡意识，对抗日宣传与民众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善于引导，凝聚救亡共识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重在讨论重要问题，通过对特定议题的思想碰撞，达到凝聚共识的目的。《信箱》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讨论问题：一是读者与编者之间的讨论，二是读者相互之间的讨论，三是读者对《星期刊》其他栏目内容发表的讨论意见。这种立体的讨论方式让《信箱》成为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而编辑在其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对栏目中涉及具体议题的信件，编辑往往采取深度剖析与策略性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与读者展开交流，共同探索方案，从而确保民族解放运动的有效推进。

当读者在表达救亡热情的同时流露出困惑时，编辑则展现出高度的情感共鸣与支持，不仅肯定其爱国情怀，还引导读者将满腔热忱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一位青年僧侣来信，表达关于如何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时参与救亡运动的疑问。编辑先是对其热情表示赞赏，随后指出佛教徒作为中国国民，当然能够参与救亡工作，还可以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将民众唤醒和组织起来，“尽这种责任，和佛教徒的名称毫无违背；反之，正是尽了佛教徒的入世救世的责任。”<sup>[31]</sup>这样的回复不仅消除了读者的顾虑，更激发了更多民众在救国事业中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热情。

编辑的回复也承担起纠正观念、启迪思考的责任。针对复旦大学张柳泉女士自杀事件引发的热议，编辑通过回复信件，深入探讨“生死”这一重大议题。面对王德谦因挚友离世而情绪激动、倾诉感慨的来信，编辑首先表达了深切理解，随后指出在同情之余，亦需正视自杀行为本身的错误性。当读者金草继续就此事寄信探讨

时，编辑则进一步鼓励青年读者以积极勇敢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广泛参与救亡行动，而非因一时挫折而放弃生命，因为“纯净有志的人多死一个，那斗争的力量也就多损失一分”<sup>[32]</sup>。既体现了对个体情感的关怀，又展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理性分析。可以说，通过编辑的桥梁纽带作用，读者不仅顺利讨论了问题，还进一步凝聚了有关抗日救国运动的共识，有力宣传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步扩张，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挑战。为了探求救国之路，邹韬奋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作为社会活动家，邹韬奋积极参与领导救国会，发表政治宣言，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拥护者；作为报刊活动家，其办刊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族解放运动，自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星期刊》及《信箱》栏目即是邹韬奋宣传、组织统一战线的“阵地”。

从《生活》周刊到《星期刊》，《信箱》一直是邹韬奋报刊实践中的“明星栏目”，是邹韬奋接触青年、启蒙青年的重要媒介。《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构筑编读间的对话桥梁，其独特互动机制深刻影响着公众舆论走向。作为栏目的引领者，邹韬奋协同编辑部成员，以精准有力、振奋人心的回信，充分调动起读者的参与热情，促进社会各界对抗日救亡事业的共识凝聚与行动统一。无论是感人事迹还是黑暗现象，无论是积极建议还是悲观求教，邹韬奋都能凭借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具体阐述后回到民族解放的宏观视角上，帮助民众树立正确认识，坚定救亡信心，不仅有力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为民族解放运动准备了“新青年”，“延安青年们，几乎每一个都述说自己曾受过韬奋同志的影响、帮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事实。”<sup>[33]</sup>在此意义上，邹韬奋完成了刘少奇在创刊之初所提出的刊物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人民阵线”，“应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的嘱托。

## 注释:

- [1] 编者. 编者的话(续昨). 生活日报, 1936-06-08.
- [2] 第14号, 设立《短筒》, 主要是答复读者具体问题, 从第14号到第28号共刊登224封回信。
- [3] 如罗兰《倾听大众心声为读者释疑指路——简析韬奋的“读者信箱”专栏》(《新闻与写作》, 1998年第8期); 程彩萍《从〈读者信箱〉专栏解读邹韬奋办刊精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 彭垒《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邹韬奋和〈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年第1期); 陈明明《〈生活〉周刊“读者信箱”研究》(黑龙江大学, 2011年), 上述研究都聚焦于前期《读者信箱》的研究。
- [4] 莫文华.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1): 10-11.
- [5] 编者.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1): 11.
- [6] 王保新. 人民阵线的危机.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2): 24.
- [7] 编者. 人民阵线的危机.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2): 24.
- [8] 莫文华.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6): 70.
- [9] 编者.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6): 70.
- [10] 编者. 关于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 生活日报周刊, 1936(11): 125.
- [11] 如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界结果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 以此为基础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参见王彬彬《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随笔》, 2007年第3期)。
- [12] 季峰.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4): 47.
- [13] 编者.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4): 47.
- [14] 难隐. 两重悲哀. 生活星期刊, 1936(27): 414-415.
- [15] 编者. 血泪的私蓄贡献国家. 生活星期刊, 1936(26): 389.
- [16] 云桥. 枪口余生. 生活星期刊, 1936(19): 237-238.
- [17] 石田. 挨了耳光空洒泪. 生活星期刊, 1936(23): 311-312.
- [18] 袁启新. 一件严重的事实. 生活星期刊, 1936(26): 386-387.
- [19] 赵公望. 不算人. 生活星期刊, 1936(26): 390.
- [20] 黄慎之. 可耻的一幕. 生活星期刊, 1936(28): 438-439.
- [21] 编者. 我的外交. 生活星期刊, 1936(23): 311.
- [22] 黄铃. 在天津的一个夜里. 生活星期刊, 1936(18): 215.
- [23] 编者. 在天津的一个夜里. 生活星期刊, 1936(18): 215.
- [24] 刘文鹤. 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8): 95-96.
- [25] 镕炉. 推广大众文化的根本问题.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5): 60.
- [26] 编者. 推广大众文化的根本问题.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5): 60.
- [27] 杨家蕴. 伟大战士的损失. 生活星期刊, 1936(25): 364.
- [28] 一个华北的学生. 法律和眼泪. 生活星期刊, 1936(25): 365.
- [29] 王彬彬. 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 随笔, 2007(3): 26-39.
- [30] 张海萍. 热血沸腾的时候. 生活星期刊, 1936(26): 389-390.
- [31] 编者. 僧伽怎样救国. 生活星期刊, 1936(27): 415.
- [32] 编者. 理智与情感. 生活星期刊, 1936(16): 190.
- [33] 萧三. 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 // 邹嘉骊. 忆韬奋.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71.

(作者单位: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余大品]